

经济转型中的制度移植与非正式制度约束

李 新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经济转型的实践表明,制度移植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制度设计。而制度移植成功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将移植来的正式制度形式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如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只关注目标制度的形式,而不关心其内涵,必然会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形成冲突,导致移植失灵,陷入制度陷阱。文章的主要观点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制度创新模式的实证分析得到支撑。

关键词:经济转型;制度移植;非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8)09-0038-11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移植了西方“最先进的”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后,不但遭遇了20世纪90年代的严重经济衰退,而且造成了该地区许多国家的解体。相比之下,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移植了市场经济的先进制度,却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巨大的反差使得许多学者感到很茫然。

一、X经济与Y经济及其决定

世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即瓦尔特·欧肯(1947)在其经典著作《国民经济学基础》中所归纳的两个理想的纯粹的基本形式:非交换的“集中管理经济”和“交换经济”(Ойкен, 1996),以及卡尔·博兰尼在他的临终著作“The Livelihood of Man”中把国民经济划分为分配和交换两种基本形式。他们都认为,这两种理想的经济秩序并存于整个人类历史,它们虽然具有阶段性,但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并存的,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制度不是世界各国经济的统一模式,在某个社会某种经济关系形式占统治地位的同时,另一种经济形式起补充作用。

收稿日期:2008-03-10

作者简介:李 新(1965—),男,河南范县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俄罗斯中亚研究室研究员。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范式。H.列别杰娃提出了不同经济形式的制度基础问题,认为制度结构决定经济文明的特点,经济文明要么建立在统一经济框架内集体合作的基础上,要么建立在个人力量的基础上。后一种社会活动的结果形成了私有制。H.德罗茨多娃指出,“体制运转的效率概念不能只以市场标准来衡量。只要是体制以最小成本达到了目标,这个体制就是有效率的”^①。她在自己的研究中证明了,在俄罗斯历史上“以国家和集体形式的产权实现了其发展目标”,O.别松诺娃在其分析中则进一步断言,俄罗斯所特有的这种经济制度是自然的、合乎发展规律的,具有循环上升的特点(Бессонова,1997)。

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制度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维习惯”^②。不同的环境形成不同的制度,任何制度在其深层都能找到其固有的独特“基因组”。俄罗斯经济社会学家 C.基尔金娜将其称之为制度元,并将其划分为 X 和 Y 两类。X 制度元的基本制度有:体现中央权力的分配经济、单一的政治结构、公有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集体和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俄罗斯、东亚、拉美等国家是 X 制度元的典范。Y 制度元的基本制度有:市场经济、联邦政治结构、自主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个人价值高于社会公共价值。在多数欧美国家 Y 制度元占统治地位(Кирдина,2004)。

经济秩序本身不会自己形成,它们依赖于具体的历史状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决定了正式制度的形成。前面提到的制度元的实质就是制度形成的意识形态。对 X 制度元来说,生产资源的公有性源于生产的原始条件。人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技术环境比较原始和恶劣,使人们在生产过程的组织中联合起来。相应地,对 Y 制度元来说,非公有性意味着技术上的孤立,物质基础设施重要元素的独立,以及与此相关的独立发挥作用、单独使用的可能性。这些要素具有分散性,并作为零散的、单个的技术对象的总和而存在。这样,个人或家庭不需要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合作,就可以独立使用生产要素,并有效地组织生产,独立地支配所获取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制度的主要职能就是保障独立的经济和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格雷夫运用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揭示了 11 世纪至 14 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同样经历了经济贸易繁荣,但在后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以热那亚为代表的意大利成为西方世界兴起的发源地,而以马格里布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却从此进入了经济的长期衰落。格雷夫的解释是,不同的制度选择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引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马格里布人和热那亚人不同的文化遗产以及他们在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对制度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使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分别形成了具有个人

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不同特征的社会。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的经济政治制度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深刻影响。文化信仰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后者的发展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格雷夫,2003)。

为了适应异常艰苦的耕作条件,在古罗斯形成了农民村社,土地、森林等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平均分配。这种以集体劳动为特征的基本经济组织形式贯穿于俄罗斯1 000多年的历史,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社会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以及集体管理的传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村社”组织在前苏联时期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形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连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也没能改变这种农业组织形式的实质,尽管它把自己变为了股份公司。这种久存于历史的“村社制度”在俄罗斯的民族传统中确立了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而俄罗斯民族的“帝国情结、绝对权威和大国意识以及官僚制度、等级制的社团主义”则是基辅罗斯被蒙古人从13世纪残暴奴役240年间埋下的种子。无论是后来的伊凡·雷帝还是彼得大帝都继承了中央专制的垂直管理,于是国家观念和大国意识、帝国情结逐渐变成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主要特征,管理的行政命令方法成为传统。与此同时,成功的大规模领土扩张使权利崇拜和军事力量崇拜变成了俄罗斯社会的一个根。随着领土的扩大和民族的增加,对无限制的集中制政权的渴望也在不断加强。促进俄罗斯社会经济进步的不仅是生产力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客观进程,而且也是强硬的国家干预。国家资本主义使俄罗斯在19世纪末加入了世界列强的行列,高度集中的计划制度使前苏联成为唯一能够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第二强国。

二、经济制度移植及其成功的决定因素

前述X经济和Y经济只是反映现实的各种经济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论抽象,现实中没有纯粹的经济体系,像帕累托所言,“两种极端是不存在的,因为完全消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如同无限保障其存在一样”^③。现实经济有着混合的形式,任何现实经济中市场、分配制度都发挥着作用,它们表示截然不同的经济资源配置和使用的社会机制。探索市场和分配的最优关系组合贯穿于任何社会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两者相互竞争和并存,两种制度相互补充。同时,任何一种经济体系的发展都具有周期性,要避免经济周期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通过制度交换寻求制度均衡,即历史地寻求与基本制度和互补制度相互关系相适应的比例关系。寻求制度均衡并非是简单的事情。引入对应制度“过度”,可能会导致相反的效应。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诺思,1994)。正式约束又称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它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或由有关各方共同制定,具有强制

力。非正式约束又称非正式制度,即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制度元,它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其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它甚至可以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从经济功能上说,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联系、相互制约^①。从某种意义上说,非正式制度比正式制度更为重要。制度的实施机制以国家为主体,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保证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的实施。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制度的改变却是长期的过程。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一些正式制度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的正式制度,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从而降低正式制度创新和变迁的成本。

经济制度移植就是制度从一种经济环境到另一种发展较低级的经济环境的移植,移植的含义在于加速制度变迁(Полтерович,1999)。但是,制度移植是具有风险并常常是昂贵的举措,其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并且往往是滞后的。由于移植的制度往往会失灵,在新的环境中“不运转”,因而制度移植还会有额外的成本支出。如果被移植的制度不能与受体的文化传统或制度结构相吻合,那么它就会逐渐萎缩并消失,萎缩的制度往往会成为更严重失灵的源泉。移植制度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对应的相反制度的活跃,这常常是移植发起人所意想不到的,对应规范的活跃往往会导致无效均衡即制度陷阱的形成。正式规则可以移植或模仿,但是这个移植或模仿的新制度可能完全不同于移植体的原制度,甚至可能是无效制度,从而形成制度冲突。制度冲突产生于供体与受体制度条件的差异。同时,通过(无偿)传播更有效的技术,供体可能依靠受体而成为赢家,在进行制度移植时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效应。战后,有许多国家推行了广泛的改革,意在通过制度移植来加速经济发展。但是,移植“成活”的案例并不多。许多学者认为移植来的制度与本国(受体)占统治地位的非正式制度不兼容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从国际市场的制度供给来看,西方专家试图自负成本来推销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和“颜色革命”。从对制度的最终需求来看,某项制度对某个居民群体来说可能是“正财富”,而对另一个群体而言也可能是“负财富”。所以,只有依靠非市场力量,首先是国家的干预,才能保障移植进程的有效性。为此,国家自身应当是足够有效的。

俄罗斯经济学家 B.波尔杰罗维奇把决定移植结果的因素分为三类:(1)社会文化特性和意识形态;(2)初始制度和宏观经济条件;(3)移植技术的选择(Полтерович,1999)。这些因素之间有个综合性的关系机制。任何移植都会改变经济中现有的约束体系,从而导致收益的再分配。在休克式移植和“不良”的初始条件下,收益再分配的规模可能会很大。由于再分配的活动比

生产投入更能有效地获得较多的收益,受损者也会很快加入再分配活动,而这又会导致新的损失。

某个社会经济环境中的非正式制度由于其内在的传统性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很差。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制度,如果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制度和旧有的非正式制度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有些进行制度变迁的国家总想尽快通过改变正式制度实现新旧体制的转轨,但这种正式制度的改变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与持续的非正式制度并不相容,即出现了“紧张”。这种“紧张”程度取决于改变了的正式制度与持续的、传统的非正式制度的偏离程度。历史上不乏一种文化环境的制度移植到另一种环境后失败的例子。然而,曾经落后但在近几十年来通过制度移植表现出最强劲增长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中国的经济机制却采用了根本上不同于自己文化背景的欧美样板。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俄罗斯尝试模仿美国制度时,美国制度是否存在与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兼容性问题在国家层面几乎未曾提起过。其实,文化惯性不能不对强制推行的制度创新的命运产生影响。根植本土的规范与推行的外来规范之间的制度冲突有时会造成没有生命力的制度,出现稳定的但无效的非均衡状态,形成所谓的制度陷阱(Полтерович, 2001)。众多案例表明,激进的决策总是会产生制度陷阱。必须认识到,决不是任何制度在一个文化环境中是有效的,就必定在另一个文化环境中也会有效运行。必须考虑到文化惯性和制度移植冲突的可能性。

假如在某个经济体制中移植来的是有效制度,但由于滞后效应它也可能陷入制度陷阱。制度的稳定根本上依赖于转型成本。转型成本的存在,一方面会加强制度的稳定性,使规范处于不变状态;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新的稳定状态的产生,即混合行为规范。在混合均衡中一种规范对另一种规范的优势会由于转型成本而消失。由于共轭效应的影响而增大的转型成本即使在协调效应不再起作用的情况下也会支持起初的无效规范。系统一旦陷入制度陷阱就会选择无效的发展路径,而且时间一长再转向有效路径就会成为不可能,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大规模经济转型表现出的结果令人失望。价格自由化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物价飞涨;而稳定物价的努力造成了严重的“三角债”和物物交换,也就是非货币经济;尝试改革税收体系又促进了影子经济的发展;削弱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反而造成了空前的腐败泛滥;“休克式”私有化的结果没有造就有效的私人有产者,反而形成了一种无效的组织形式——归劳动者所有的开放式股份公司,亦即内部人控制。所有这些都伴随着空前的和无法预见的生产衰退。制度陷阱的产生是推行改革的主要危险。

三、制度陷阱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

就制度移植的方式来说,激进自由主义的“休克式”战略仅仅局限于引进形式上的制度。但是,如前所述,每个规则体系包容着许多实现方式,这是由文化和制度环境所决定的。所以,制度移植的核心是内涵而不是形式,而移植体的适当变形能够轻易地适应新的环境。结合中国的经验,在特区移植先进制度,进行系统的制度试验,再经过不同的变形在全国不同地区得到检验和推广。制度“培育”战略则可以有条不紊地解决移植体的选择问题。最重要的是建立具有连续性的中间制度,即平稳地把初始结构与符合被移植制度的终点结构连接起来的制度,典型的是中国的“双轨制”。这一制度将“培育”和“设计”的优势结合起来,并能够控制制度建设的速度。移植体可以是任何国家的现有制度或过去存在过的制度。政治家往往希望引进最先进的制度,试图最大限度地加速制度发展。这种希望恰恰会导致犯错误。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全力模仿西方的行政原则,而这种努力最终失败了,因为这些原则与民族道德规范相矛盾。

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要使制度稳定,必须使移植来的正式制度与本土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互衔接,二者之间的协调效应、学习效应、共轭效应,以及文化惯性能够有效防止制度陷阱的产生。要有效地避免制度移植失灵和制度陷阱的出现,就不能忽视国家的作用。在转型时期制度结构不稳定的情况下,急剧变化的企业状况会更加依赖于偶然性而不是管理的质量。所以国家的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目的是防止陷入临时困难的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和一系列部门的破产,保持经济增长。关于国家应当怎样干预经济这个问题,目前尚没有统一的认识。就在不久以前大量的经济学家认为国家干预应当局限于所谓的市场失灵的情况。所以“华盛顿共识”包括了取消调控、私有化、经济自由化,但对政府的作用只字未提。只是后来一些经济学家才注意到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中国台湾和韩国,他们的改革不是从私有化开始的,而是开始于在具有良好前景的新的市场部门建立国有企业,同时它们是逐渐放开对外贸易的,30多年了依然保持着国家对外国投资的监控。Rodric指出,墨西哥、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用5年的时间在私有化以及外贸和金融自由化方向比东南亚国家30年走得还要远,而取得的成效远不如后者^⑤。近年来自由激进主义思想越来越难以找到支持者。代表“后华盛顿共识”的斯蒂格利茨确信“政府应当成为市场的补充”。他特别强调政府在发展人力资本和引进、创造新技术方面的作用。这两个因素在“经济奇迹”国家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制度非均衡条件下,除了政府没有一个代理人能够采取有效的长期决策,完善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没有力量将经济代理人的利己行为转化为对社会有利的行为。

经济转型国家的统计资料显示,相对较大的影子部门与更深刻的转型衰退是吻合的。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遭受改革的灾难最轻,他们没有急于自由化,而且国家支出非常庞大。相反,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改革更为迅速,速度上仅次于俄罗斯。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在改革之初影子部门并不大,政府的作用比较有力,所以他们能够保证迅速的自由化。1999 年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对 20 个转型经济体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 9 个转型“最成功的”国家中,只有爱沙尼亚、克罗地亚和波兰三个国家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平均指数低于俄罗斯。1999 年这 9 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表明,补贴和其他经常性转移支付在 GDP 中的比例都超过俄罗斯^⑥。也就是说,在经济转型时期国家对实际部门的支持是经济有效发展的重要因素。而 IMF 的专家则建议以最快的速度移植先进制度并坚持通过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来实现稳定。一系列研究表明 IMF 的政策是无效的。1970 年以来 IMF 与 79 个国家签订了 1 000 多个协议,但这些国家和没有 IMF 项目的国家进行比较,后者所取得的成就明显大于前者。“……IMF 的项目阻碍了增长”^⑦。

中国的经济转型,从内部新旧体制而言,采取的是一种“双轨制”渐进方式,即体制内(国有经济)基本上保持不变,体制外(非国有经济)优先发展。这是典型的制度移植,但是这种制度移植完全不同于俄罗斯: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略先于市场制度改革,是试点改革与推广改革相结合,局部改革与整体改革相结合,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相结合,自上改革与自下改革相结合,强制改革与诱导改革相结合,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相结合,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受控和渐进的改革轨迹和态势。中国的制度移植属于前述制度创新的范畴,将移植来的正式制度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形成长期的磨合,从而减少了移植制度的“死亡率”,大大提高了它的“成活率”,有效避免了移植失灵导致的制度陷阱。中国的经济转型和俄罗斯一样属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但不同的是:由于政府主体在力量对比与资源配置权力上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政府主体是决定制度供给的方向、速度、形式、战略安排的主导力量,由政府主体安排的制度创新与非政府主体对制度创新的需求相适应,社会摩擦较小。

四、制度创新:中国与俄罗斯殊途同归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使得“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关注。对于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学者们莫衷一是。但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归结到底就是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通过前面的分析,任何一种模式都无法全面移植到别的国家。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必然会自食苦果。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以及拉美国家曾经

信奉“华盛顿共识”所设计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结果使经济发展陷入危机,教训深刻。中国以开放的态度,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2)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市场决不是万能的,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是克服市场失效的必要手段。中国在大力推进市场经济的同时,始终维护政府的强势地位,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社会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重目标的顺利实现,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3)以社会利益和谐为核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必须要以和谐的利益关系为核心,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把消除贫困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4)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把保持稳定放在首位,并在此基础上,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先稳定后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改革促发展,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协调和平衡。正是遵循了这样一种协调发展的策略,中国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平稳转型。(5)以渐进的方式推动改革。改革的复杂性决定了应当采取渐进的改革策略,努力实现经济转型和发展的软着陆。遵循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顺序。

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转型的灾难,俄罗斯充分认识到了“华盛顿共识”的严重危害性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开始重视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普里马科夫政府在 1999 年提出了稳定经济新纲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宣告结束。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探索适合俄罗斯特点的经济改革道路。普京接掌俄罗斯政权后,彻底抛弃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强了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在经济中的作用,对“休克疗法”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治理整顿,得到全国民众的积极支持,形成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经济增长开拓了空间,同时经济回升也为政局稳定提供了重要条件。普京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俄罗斯现实有机结合起来”的“可控的市场”和“主权民主”模式理清了俄罗斯多年来的模糊发展战略:(1)削弱地方领导人权限,对地方政府进行协调和监督,强化中央垂直管理体制,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实现了社会的稳定。(2)深化行政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国家机构,改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把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实际结果作为评价整个国家机器的主要标准。打击官僚腐败,开展全国反腐肃贪运动,缓解了导致俄社会政治动荡的根源性问题。(3)调整私有化战略,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战略部门的控制。自 2004 年以来,俄罗斯国民经济各主要行业陆续出现了重新国有化的迹象(赵秋艳,2006)。在能源、军工、飞机制造、重型机械、核能、矿产开采、汽车制造、海洋运输、航空运输、银行、造船等几乎每个重要战略领域都建立起了大型国有控股公司,大大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终结了“寡头政治”,遏制了寡头们对国家经济的掠夺,使国民经济命脉重新掌握在国家手中。(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

力消除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制约。根据普京的《2020 年俄罗斯发展战略》，在利用现有资源和现有生产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新经济部门发展，即走创新型经济增长模式，推行人力资本发展战略，加速从资源型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发展型模式的转变（Путин，2008）。（5）以人为本，建设公民社会。确立了“休养生息”的国家民生工程，优先发展医疗、教育、住宅建设和农业。

普京执掌俄罗斯政权 8 年来，可以说俄罗斯已经完全恢复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丧失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GDP 增加了 72%，居民实际收入增加了 1.5 倍，经济规模总量接近 1.2 万亿美元，居世界第 7 位，预计 2008 年进入世界六强，同时，农业也走出低谷，成为世界粮食第三大出口国。近年来俄罗斯形成了投资和消费的高潮，开始了大规模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机械制造和住房建设、航空航天和船舶制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行经济结构改造的庞大计划。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自主整体上得到了保证。国内政权实现了“梅—普组合”，权力集中趋势进一步加强，国家的经济作用越来越大，增强军事实力，逐步确立了“可控的民主”和“可控的市场”的政治经济格局。为实现 2020 年前进入世界五强的目标，俄罗斯确定了“2020 年发展战略”，实施国家的创新发展战略，要将俄罗斯建设成为一个世界金融中心。

俄罗斯之所以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首先是得益于选择了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有利的形式，而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的制度移植与本土的非正式约束形成的严重冲突则是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的根源。普京的“拨乱反正”，与本土非正式约束紧密结合的制度创新是 21 世纪初俄罗斯经济复苏的制度基础，高油价背景下的能源出口是俄罗斯经济复苏并努力改善经济结构，发展创新经济和高技术部门的契机。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2008 年梅德维杰夫接替普京成为俄罗斯新总统之后，仍会实行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原则，国家对经济加强控制和干预的趋势只会加强，不会削弱。

注释：

- ① Дроздова Н. П.: Неони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концепц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Постановка вопрос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на пороге XXIV, (2); Юрист, 1998, стр.693.
- ②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139 页。
- ③ Зотов А. А.:《Анализ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В. Парето (работы 1898—1903)》，Социс, 2001, 2, стр.36.
- ④ 本文将非正式制度看作正式制度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制度”一词在本文中与“规范”或“约束”是等价的。
- ⑤ Rodric D: Understanding Economic Policy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6, 34: 9—41.
- ⑥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Economic Survey of Europe, United Nations, 2001: 57.

- ⑦Przeworski A, Vreeland J R: The Effect of IMF Programs o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62: 31.

参考文献:

- [1] 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2] 热若尔·罗兰. 转型与经济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 赵秋艳. 浅析当前俄罗斯经济中的“新国有化”趋势[J].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2006, (7): 13—16.
[4] 高粱. 浅析普京政府的经济政策改革[J]. 当代经济研究, 2006, (8): 20—26.
[5] 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6] 阿弗纳·格雷夫. 历史制度分析: 从经济史视角研究制度问题的新进展[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3, (5): 30—43.
[7] Бессонова О Э. Институты раздат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ретроспективный анализ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ЭиОПП СО РАН, 1997.
[8] Кирдина С Г. X и Y экономик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анализ[M]. М.: Наука, 2004.
[9] Лебедева Н Н.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форма хозяйствования: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основы [A].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на пороге XXIV. (3) [C]. М.: Юрист, 2000: 63—72.
[10] Ойкен В. Основ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M]. М.: Экономика, 1996.
[11]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M]. N.Y.: Farrar & Rinehart Inc., 1944: 68—76.
[12] Полтерович В М.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ловушк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реформы [J].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1999, 35(2): 24—41.
[13] Полтерович В М. Трансплантац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J].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2001, (3): 12—35.
[14] Путин В В. О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до 2020 года[EB/OL]. <http://www.regnum.ru/news/954426.html>, 2008-05-08.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and Constraints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Economic Transition

LI Xin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transition is nothing but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transplantation. To a large extent, the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is more widespread than institutional design. Because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form of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rather than institutional connotation, the “survival rate” of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下转第 143 页)

[21]Morck R, D Wolfenzon, B Yeung. Corporate governance, economic entrenchment and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5, 43: 657—722.

Pyramid Structure、Ownership and Small Shareholders' Interest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LUO Dang-lun¹, TANG Qing-quan²

(1. *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of pyramid structure of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3 to 2004,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impacts of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layer structure on interest losses of small shareholde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lthough pyramid structures among listed companies are popular, the influences of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layer structure on interest losses of small shareholders differ a lot, owing to different nature of ownership. Only in those priv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the separation of control right and cash flow right, and the lever of control layer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interest losses of small shareholders, which is not common in those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This could be due to the different forming causes of pyramid structures under different ownership.

Key words: pyramid control;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y; small shareholders' interest protection

(责任编辑 金 澜)

(上接第 47 页)

is low. The conflict between transplanted institution and native informal institution conduces to transplantation failure, so the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gets into institutional trap. The only countermeasure of escaping the trap is institutional renovation. In other words, it means to make transplanted formal institution and the native informal institution in perfect harmony. The main viewpoint of 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the empirical study about institutional renovation models in Russia and China.

Key words: economic transition;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informal institution

(责任编辑 金 澜)